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研究项目

中印关系 现状·趋势·应对

赵干城◎著

STATUS QUO & PROSPECT
A STUDY ON CHINA-INDIA RELATIONS

时事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研究项目

中印关系

现状·趋势·应对

赵干城◎著

STATUS QUO & PROSPECT
A STUDY ON CHINA-INDIA REL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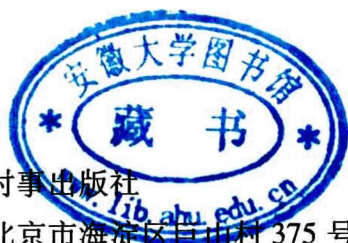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印关系现状·趋势·应对/赵干城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80232-669-9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中印关系—研究 IV. ①D822. 33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6471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 100093

发行热线: (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 (010) 61157595

传 真: (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7.5 字数: 270 千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研究项目的成果。自 2010 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关于中印关系现状、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的课题项目（批准号 10BGJ014）后，笔者对自己长期以来从事的中印关系研究进行了总结式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基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提供的便利条件，对当前中印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大量走访和调研，并利用多次赴印度参加研讨会的机会，与印度学者和智库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最终形成了本书中的总报告，以及在总报告完成前先期发表在学刊上的相关论文。这些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内容。

中印关系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传统的地缘政治格局中，这个双边关系通常被描绘成以竞争和对抗为主，这也成为西方学者和媒体观察中印关系的一个主要视角。然而，中印关系发展的动因并不是西方观点所提供的，而是由这两个亚洲大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双方的根本国家利益则包含了诸多新的层面，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两国的地位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为两国关系的定义和性质提供了评估的新途径。这是展开和研究本课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其思路是中印关系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但这并不表明两个亚洲大国的相处模式必定是争斗。当然，两国间确实存在着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中边界划分占有突出的地位，但又不仅是边界划分，事实上当前国际舆论及学界在分析中印关系现状时常常将两国的快速发展或曰“共同崛起”，视为决定中印关系的最重要因素，甚至认为其可能成为 21 世纪国际政治演变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当然如上所述，

诸多研究在指出这种现象的同时，经常也是从负面或消极的角度来观察的。鉴于此种现实，两国决策层都注意到将中印关系置于全面对立和对抗的舆论环境，以及有关国家因此而采取的种种“制衡”、“再平衡”策略动机，从理性决策和国家根本利益出发，两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并在众多双边或多边场合强调世界有足够空间让两国共同发展。本书集中分析了这种变化的原因和前景，强调中印关系确实有相当大的脆弱性，但在任何意义上，冲突或“持久的争斗”都不是两国关系的宿命式结果。

中印互为“伟大的邻邦”，都有着杰出的文明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但正如其他有着这些特点的文明古国一样，在现代国际政治史上，两国都一度被西方强权和强盛的武力所压倒，成为民族记忆中难以消除的情结。这对中印关系以及两国人民如何看待对方应该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但在现实政治中，这种情况并未如预料的那样发生，甚至两个邻居之间的民间交流和文化往来，无论是就规模还是质量来看，都远不尽如人意。这已经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一块短板。半个多世纪前，两国共同声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两个政治社会制度不同、人文精神亦有较大差异的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是其核心，至于如何和平共处确实也存在着很大的探讨空间。以当代国际政治发展的经验来看，如果和平共处只是某种“冷和平”的状态，则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也不一定令人乐观，这是探讨中印关系时特别需要加以关注的一个领域。中国新一届政府就任后，最高领导人相继出访邻国，一再强调“国之交，在于民”，说明中国领导人已经充分意识到民间和文化交往在国与国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可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两国间在历史上由于地

理阻隔的原因交往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而在现代由于种种原因，两国民众亦缺乏了解对方的兴趣，使双方在看对方时就很容易产生偏差甚至误解。笔者多次访问印度，走遍印度各大城市，从各个层面观察印度民众，虽不可说已经深入了解印度，但对上述问题仍有较深感受，并希望在两国快速崛起于仍由西方主导的当代国际体系的进程中，两国民众能大幅提升了解对方的兴趣，这即使不是解决中印关系核心问题的灵丹妙药，也必定是正确理解双方关系的必要入口。

本书既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研究项目的成果，也是笔者从事中印关系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得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的鼎力支持，邵育群教授、王伟华博士、刘宗义博士等诸位同仁亦给予了不可或缺的帮助，时事出版社谢琳主任对全书进行了编辑，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感谢。至于书中出现的所有错误和不当之处，当然都由笔者负责，并期待读者不吝指正。

赵干城

2013 年于上海

目 录

总报告：中印关系现状、发展趋势与应对	(1)
一、导言	(1)
二、中印关系：简短的历史回顾	(6)
三、中印关系现状	(12)
四、中印关系发展趋势	(37)
五、稳控中印关系的对策建言	(59)
印度的“强国梦”与中印关系	(74)
一、印度“强国梦”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75)
二、印度“强国梦”的现实前景	(77)
三、印度“强国梦”与中印关系	(82)
印度洋：中国海洋战略再定义的动因	(87)
一、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	(88)
二、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取向	(91)
三、中国的印度洋战略面临的挑战	(96)
中国如何估量印度崛起	(100)
一、官方观点和民间舆论的差异	(101)
二、印度崛起的影响与中印关系前景	(104)

略论中印经贸关系若干问题	(109)
一、两国经贸关系非均衡问题	(109)
二、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政治因素	(113)
三、积极应对中印经贸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	(118)
中印地缘安全关系初探	(121)
一、中印地缘安全关系的基本要素	(122)
二、中印地缘安全关系的发展思路和前景	(125)
美国的南亚战略与中印关系	(133)
一、拉登之死与美国的策略调整	(133)
二、美国策略对周边地区大国的影响	(136)
三、中印在本地区的合作前景	(140)
印度如何估量中国崛起	(144)
一、印度观察中国的政治视角	(144)
二、印度如何评估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差异	(147)
三、印度的“中国观”与中印关系	(149)
中印关系的地缘政治特点与发展前景	(151)
一、中印政治关系脆弱性的内涵	(152)
二、中印共同崛起的地缘政治意义	(155)
三、谋求战略伙伴关系的现实与前景	(159)
中印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特点	(163)
一、中印共同崛起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164)
二、中印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特点	(167)
南亚地区安全的大国博弈	(174)
一、美国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困局	(174)

二、印度的地位与作用	(177)
三、中国的南亚政策与影响	(180)

南亚国际格局的塑造与中国的抉择	(184)
一、战略自主的必要性	(184)
二、南亚国际体系形成的条件	(188)
三、中国与南亚国际格局的建设	(192)

塑造身份认同 巩固战略基础

——略论新中国 60 年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演进	(197)
一、意识形态之争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	(198)
二、中美苏“三足鼎立”与“三个世界”理论	(200)
三、改革开放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战略	(203)
四、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205)

中国对印度战略浅析	(208)
一、中国谋求改善和发展对印度关系的战略因素	(209)
二、中国对印度战略的基本理念	(213)
三、中国发展对印度关系的政策选择	(217)

发展中大国兴起与国际体系	(220)
一、当代国际体系的核心问题是发展	(220)
二、新兴大国的发展理念与影响	(224)
三、发展中大国与国际体系演进	(230)

印美关系发展与中印美三边关系	(233)
一、印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233)
二、中美印三边关系：尚未成型的均衡	(236)

中俄印战略关系的政策意义与发展前景	(240)
一、中俄印合作的基础	(240)
二、中国在三边关系中的作用	(244)
三、中俄印战略关系的发展前景	(247)
中印和平共处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意义	(251)
一、中印和平共处的历史教训	(252)
二、中印共同崛起	(256)
三、正确处理中印关系：在崛起中和平共处	(262)

总报告：中印关系现状、发展趋势与应对

一、导言

中国和印度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新兴大国，互为紧密邻居，有着长达数千公里的未定边界，^① 两国分别在亚洲大陆和次大陆拥有广袤的国土，都将对方视为重要的战略性邻国。近年来两国为界定双方关系的性质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 2005 年 4 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宣称要将两国关系提升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虽然大部分分析人士都认为这是两国关系的一种愿景，并非已经实现了的现实，但有还是没有这个愿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有这个愿景显示了两国决策者清晰的政治意志；没有这个愿景，两国关系中就可能不断出现诸多模糊不清且随时可能走向反面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看，温家宝总理的这次访问在当前的中印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尽管有着上述明显的进展，但没有人会否认中印关系当前正进入最

^① 关于中印未定边界究竟有多长也是两国之间的一个争端，自 1959 年两国围绕边界划分而起的争端逐渐尖锐化后，中国外交部门所发之照会都指出了两国有长达 2000 多公里的未定边界，但这并不为印度方面所接受。后者认为两国未定边界长达 3000 多公里，主要分歧在于印度认为中国所控制的新疆阿克赛钦地区为印度所有，这将使两国边界线往中方领土方向大大延伸，当然会遭到中方的驳斥。见《人民日报》1959 年 10—12 月关于两国边界争端的外交照会和领导人往来信函等历史文件。

为敏感的时期。所谓最敏感并非是指两国关系到了非常严重的对抗对峙时期，而是指两个新兴大国由于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更可能由于两个发展中大国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差不多同步实现高速增长而成为国际体系中最令人瞩目的新兴大国，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性质是什么？其发展的前景对两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就中国而言，应如何应对这种性质尚不非常清楚的挑战，并在发展的进程中将这种挑战转化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某种机遇？这类问题是本报告希望解答的。

首先，中印关系是当今国际体系中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很难用某一个词语来完整定义。美国学者约翰·加弗企图用“争斗”这个词限定中印关系的全部内涵，^①这反映了西方学界对中印关系的一种期许，其出发点是传统的地缘政治观，既包含了相邻大国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争斗是永恒属性的理念，也隐含了西方在其主导的现行体系中更愿意让尚处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大国处于该种状态的预期，因为这种状态显然更有利于现行体系的延续。但发展中大国的相互关系并不是由西方来界定的，也不会按西方的利益来运行。尽管这个道理是中印两国都愿意接受的，不过也必须承认，迄今双方还没有真正解决如何限定两国关系之内涵的问题，而这个内涵很显然属于两国政治关系范畴，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第二，中印关系中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究竟在双边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大部分分析人士都同意，尽管边界争端在中印关系中仍居于核心地位，但两国领导层在过去的10多年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如果将此问题再上溯至两国关系真正解冻之初的1988年（即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后），从双方为维护双边关系发展妥善处理边界争议而采取的大量措施可以看出，尽管要完全解决边界争端（即

^① 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2001. 该著作的书名或可译为《持久的争斗：中印在20世纪的对峙》，显然在作者的心目中，中印关系最具本质意义的属性是 Contest，该词在英语中既有争斗、争夺的意思，也常被用来指称竞赛、竞争，这两层意思在汉语中显然有不同涵义，前者以消极的敌对为主，后者则完全可包含正面的积极意义。但该书的内容显然指向了前者。

在两国之间划出一条符合国际法又为双方所接受的边界线)可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但两国处理该争端已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此基础上两国已经成功维护了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从这个角度来看,边界争议在两国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其实可能已经降低,或者说该问题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而不构成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因素的重要性还可能进一步下降,直至两国达成最终解决的妥协方案。这是一种乐观的评估。

另一种评估则是相反方向的,或可称之为悲观的预测,其认为两国解决领土纷争的难度将随着两国国力的快速上升而加大。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边界争端作为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其重要性也在上升,只要边界争端得不到解决,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就不可能有重大进展,而且这还是一种双向的消极互动,即由于边界争端的核心问题难以解决,双方在其他领域的猜疑和互不信任也将加剧,而这些猜疑和互不信任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解决边界争端的难度。如此循环互动会导致双边关系呈螺旋形下滑的趋势,其极端可能是成规模的武装冲突。持这种观点的人士一般被称为“鹰派”,在中方尚不是主流,但在印度战略学界和一些公共舆论领域已经呈发展趋势。

笔者并不认同上述悲观论点,但将对这种有一定代表性的“看坏论”进行详细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言。

第三,安全关系是中印关系中最脆弱的一环。自1962年边界冲突中印度军队被击败以来,印度方面将中国视为对其国家安全威胁的看法从未真正消除过。而且,根据印度方面已经解密的档案材料来看,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印度决策层内部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的看法就已经相当成形了,其根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地缘政治方面的;二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印度决策层重要的负责人士直至最高领导人都在安全问题上对中国持消极的看法。这在本报告的历史回顾部分将予以阐述和分析。

众所周知,历史因素所形成的安全关系中的消极方面会因国家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新的力量对比而进一步扩大。中国和印度虽同为发展中大国,但两国的力量对比近年来呈差距拉大的趋势,这主要是由经济

发展的速度和国家实力增长的幅度所决定的。印度在各个领域全面落后于中国的趋势非常明显，反映在安全关系上就表现为：印度在中国的国家安全考量中地位呈下降态势，而中国在印度的国家安全考量中地位与日俱增。这一升一降造成的不均衡状态加剧了两国本来就很脆弱的安全关系的消极方面，并因中国力量的延伸和维护全球利益的需要，印度在安全问题上对中国的看法进一步扩大至新的地域：如印度在认为是其传统势力范围的印度洋及其他地区采取认为有反制作用的措施；开始涉足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等。中印安全关系出现了向新的地区乃至全球范围扩大的趋势。

第四，中印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中最具积极意义的领域。双方的贸易额从21世纪初微不足道的20多亿美元开始，在短短的10余年间迅速扩大到超过700亿美元，增幅可观，反映出两国商界抓住了双方经济结构中的互补空间，成功打造了双边关系中合作共赢的基础。与此同时也应看到，虽然双方经贸合作的空间仍然非常巨大，但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其中既有历史遗留问题和其他政治因素对经贸关系所起的消极影响，也有两国经济结构相似所产生的互补性下降而竞争性上升的原因。如何保持和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可持续性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本调研报告关注的重点之一，将在下文中详细阐述。

第五，民间交流是中印文化关系的核心要件。中印同为世界人口大国，又是邻居，在历史的长河中，两国通过民间交流曾经创造了两国文化关系上的壮举：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在东亚和东南亚传播，缔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虽然现代史上两国之间的短暂冲突造成了两国民间交流的中断，但这两大文明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学习却从未停止过，两国都有杰出的学人继承民间交流的薪火。如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创办国际学校，以学习中国文化为主，即使在两国发生边界冲突后也没有中断其既定的事业；在中国，季羨林等老一辈学人认真研究印度文化。近年来，两国民间交流在两国领导层的鼓励下有实质性进展，两国总理倡导的青年交流互访项目在两国政府的努力下顺利实施，既扩大了青年之间的交流，也是对未来中印关系的投资，因此受到了高度重视，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尽管民间交流呈积极态势，但双方的民间舆论无论是对中印关系本身，还是对曾经有过的冲突以及将来可能产生的分歧等，都存在广泛的异议，甚至在某一些极端观点看来，双方为敌乃是必然趋势，冲突不可避免。诸如此类的观点，在双方的公共媒体上不时见诸于众，这种舆论虽然不一定是主流，但却可以对两国关系造成实质性损害，这也是本文所调研的重点之一，下文将详细分析公共舆论对于塑造双方看对方的重要作用，并提出相关的应对思路。

综上所述，根据中印关系各个领域的现状，本文综合分析双边互动在各个层面上的发展趋势，认为由鉴于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其所呈现的发展趋势同样存在多重复合的状态，难以某个单一的趋势来预测中印关系的发展。在这些复合发展的趋势中，对两国关系的总体把握需要有长远的看法，而不是停留在就眼前的争端所产生的见解上，即使这些短期的看法也有充分的根据。这是本文坚持的视角，因为在当前中印关系呈现日益复杂局面之际，各种矛盾摩擦此起彼伏，无论是政经方面的还是军事安全方面的，亦或是文化民间层面的，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加之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固有的地缘政治猜疑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发酵，这种复杂情况很容易导致产生匆忙的看法：希望有快刀斩乱麻方式，求得快速干脆的解决方式，甚至希望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但是，这些都不是正确处理中印关系的思路。笔者深信，中印关系是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道路上必须妥善处理的重要双边关系之一，其重要性将随着双方力量的增长而上升，也将随着双方各种矛盾摩擦的增多而加大，因为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消极的方面，则双方采取积极措施取得的成果也将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会化为无用的政治辞藻。与此同时，负面的因素却因而放大，导致两国难以和平相处，在某一个极端甚至不能完全排除冲突的可能，这对亚洲的和平与稳定都是极大的挑战。本着这个思路，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言，并对两国关系如果破裂会产生的后果提出预案设想。这当然不意味着本文的结论是两国关系将走向破裂，而是从最坏处着想，但往最积极的方向努力。这是本文在下文展开的基调。

二、中印关系：简短的历史回顾

当代中印关系始于独立后的印度与 1949 年成立的新中国之间的交往。如此限定当然不是说此前中印之间的互动不可纳入当代中印关系的范畴，例如印度大诗人泰戈尔 20 世纪 20 年代数次访问刚推翻帝制不久的中国，就曾经是中印文化关系中的灿烂一页。如此限定主要是因为此前印度尚无独立地位，而中国基本受制于内乱外患，两国之间固然有交往，但印度的外交政策完全掌控在英国殖民者之手，直至印度 1947 年取得独立，而就在两年后新中国诞生，这两个事件在亚洲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开创了中印关系的全新一页。因此，将当代中印关系限定于独立后的印度和新中国之间的交往既是出于分析上的便利，也有事实上的根据。

印度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印度的这个外交行动显然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看法不同，显示出印度独立之初在外交上已有独立行动的政治意志，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促使印度决定立即与中国建交，那就是西藏。在某种意义上，双方围绕西藏展开的外交行动是当代中印关系的发轫。虽然周恩来总理 1949 年 10 月致尼赫鲁总理的建交信函以及尼赫鲁 1950 年 1 月的回函都没有提及西藏，加之双方为建交而展开的谈判直至 1950 年 4 月 1 日发表建交公报，其间双方是否讨论到西藏的地位及印度在西藏地区的存在等问题目前还不清楚，但从印度方面解密的档案文件，以及中方为解决西藏地区长期以来体现出来的分裂趋势而采取的措施等方面来看，应当说西藏问题在中印建交之初就已凸显，而在两国建交后最先成为重要谈判议题的也正是西藏问题。

西藏系中国固有领土从来就是中国人民固有的观念，但在印度却有着很不同的看法。1950 年 10 月我中央政府下令向西藏地区派驻军队，此举在印度内阁引起震动。根据印度方面解密的档案，当时的内政部长、

对印度的统一作出重要贡献、被称为“印度铁腕”的帕特尔曾向尼赫鲁建议对中国开战，理由是“西藏如为中国占领，印度将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问题（西面系指巴基斯坦，印度刚和巴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打过仗——作者注），而印度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则是另一个理由，印度不能信任中国”。^①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中国政府派遣解放军入驻西藏除了完成国家统一的目标外，还含有对付印度的战略意图，为什么印度会认为中国军队进入与印度接壤的地区就一定意味着“兵临城下”的威胁呢？帕特尔给出的理由是意识形态，另一个理由是西藏归入中国后印度将面临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前一个理由遭到尼赫鲁的驳斥，但后一个理由却为尼赫鲁所接受，尽管他坚决不同意印度应该和中国为了西藏的归属问题而开战。为此，印度和中国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就印度在西藏地区是否存在是否应继续保持下去以及以什么方式保持等进行了颇为激烈的讨论。印度希望继承英国殖民者的全部做法，能够继续让印度在西藏保持实质性的外交存在，这当然不可能为中国所接受。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中方照顾到印度与西藏地区的传统联系，同意印度可继续与西藏地区保持通商贸易联系和设立相关的办事机构，同时坚持了西藏主权归属中国的原则立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和解，并在协议签署后的不久周恩来访问新德里，与尼赫鲁发表声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成为中国外交的里程碑。尽管这是当代中印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两国随后也确实有一段关系亲密的时候，但根据印方的材料，尼赫鲁在当时对中国其实仍然是戒心深重的。1954年7月，也就是五项原则声明发表后的3个月，他在另一份致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备忘录中暴露了对中国的戒心，认为“（关于西藏的）协定是我们和中国与西藏（他将中国与西藏分列——作者注）的关系的起点，确认了……北部边疆应该被视为一个坚定明确的地区，不容许与任何人讨论。在整个边疆地区都要设立哨所，特别是我们应在可能被认为有争议的地区要设立哨所”。^② 也就是说，在处理西藏分歧时，尼赫鲁做了一个双重的建构：在

① Home Minister Vallabhbhai Patel's Note to the Prime Minister, November 7, 1950, quoted in Charan Shandilya, *India-China Relations*, Supriya Art Press, Ghaziabad, March 1999, pp. 190 - 193.

② D. R.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Tulsi Shah Enterprise, Bombay, 1968, p. 138.